

## 现代土耳其女性主义思潮与运动的嬗变

杨玉龙

**内容提要** 1923年现代土耳其国家建立后，凯末尔政府实施了自上而下的国家女性主义改革，而自下而上的民间妇女运动亦同时兴起，由此出现了土耳其女性主义思潮与运动双向互动的发展态势，妇女的平等权利得到一定保障。经历妇女运动低潮期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土耳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改善，该国女性主义思潮分化，以世俗女性主义、伊斯兰女性主义、库尔德女性主义等为代表的女性社会思潮，通过各类女性组织开展维护女性权益的社会运动，有力推进了土耳其妇女事业的进步。其中，宗教与世俗、族群等因素成为女性主义思潮分化的主导因素。21世纪初正发党执政后，正发党政府一方面延续了国家女性主义精神，促进了两性平等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正发党政府与激进世俗女性主义者、世俗女性主义者与伊斯兰女性主义者、库尔德女性主义者与世俗女性主义者之间，在涉及妇女地位、权利、义务等方面仍有不少分歧，使女性主义思潮的论争日益激化，加剧了土耳其女性运动发展的复杂性。如何进一步提升妇女地位、实现妇女教育、就业、参政等方面的平等，仍是未来土耳其女性主义运动的主要目标。

**关键词** 女性主义 土耳其 国家女性主义 正发党 伊斯兰女性主义

**作者简介** 杨玉龙，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 710069）。

女性主义（Feminism）又被称为女权主义，是指力图消除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批判男权社会的父权制、促进两性平等的社会思潮及其社会运动。女性主义自诞生于近代西方社会以来，对于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和维护妇女权利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19世纪末期，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传入中东地区的传统伊斯兰社会，奥斯曼帝国末期的坦齐马特西化改革进程中已经萌生了最初的土耳其妇女运动思潮与实践，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精英阶层西化妇女群

体的生活方式,不过其影响非常有限。自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至今近百年间,土耳其女性主义思潮经历了从萌发到持续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总体而言,现代土耳其女性主义思潮与实践对于土耳其政治、社会、宗教、民族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于土耳其女性主义(Turkish Feminism),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4个研究主题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成果。其一是关于凯末尔国家女性主义的研究。《土耳其妇女地位初探》等文总结了凯末尔国家女性主义的积极影响和存在的弊端。<sup>①</sup>其二是关于土耳其民间女性主义运动的研究。纳克特·希尔曼(Nükhet Sirman)等分析了民间女性主义组织发展困境与前景;<sup>②</sup>《探析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女权运动的嬗变》分析了土耳其民间女性主义兴起的积极影响。<sup>③</sup>其三是伊斯兰教与女性主义研究。古尔·阿尔迪卡提·马歇尔(Gul Aldikacti Marshall)认为,伊斯兰女性主义合法性与前景在土耳其面临着严峻挑战;<sup>④</sup>穆斯林妇女运动的主要目标是重建穆斯林妇女的社会身份认同。<sup>⑤</sup>《试论土耳

---

① 范若兰:《土耳其妇女地位初探》,载《西亚非洲》1989年第2期,第69~73页;刘源:《20世纪土耳其女权主义发展历程研究》,贵州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② Nükhet Sirman, "Feminism in Turkey: A Short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on Turkey*, Vol. 3, Fall, 1989, pp. 1-34; Günseli Berik, "State Policy in the 1980s and the Future of Women's Rights in Turkey", *New Perspectives on Turkey*, Vol. 4, Fall, 1990, pp. 81-96; Nüket Kardam & Yakin Ertürk, "Expanding Gender Accountability? Women's Organizations and the State in Turke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ganization Theory & Behavior*, Vol. 2 No. 1, 1998, pp. 167-197; Simel Esim & Dilek Cindoglu, "Women's Organizations in 1990s Turkey: Predicaments and Prospect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5, No. 1, 1999, pp. 178-188; Sibel Erol, "Feminism in Turkey", *New Perspectives on Turkey*, Vol. 8, Fall, 1992, pp. 109-120; Deniz Kandiyoti, "Women and the Turkish State: Political Actors or Symbolic Pawns", in Yuval-Davis N. & Anthias F., Campling J. eds, *Woman - Nation - Stat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89; Deniz Kandiyoti, "Emancipated but Unliberated? Reflections on the Turkish Case", *Feminist Studies*, Vol. 13, No. 2, 1987, pp. 317-338; Yeşlim Arat, "Obstacles to Political Careers: Perceptions of Turkish Wome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 No. 3, 1985, pp. 355-366; Yeşlim Arat, "Democracy and Women in Turkey: In Defense of Liberalism", *Soci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der, State & Society*, Vol. 6, Issue 3, 1999, pp. 370-387; Yeşlim Arat, "Toward a Democratic Society: The Women's Movement in Turkey in the 1980s",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Vol. 17, No. 2, 1994, pp. 241-248.

③ 任颖:《探析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女权运动的嬗变》,《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102~106页。

④ Gul Aldikacti Marshall, "A Question of Compatibility: Feminism and Islam in Turkey", *Critique: Critical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17, No. 3, 2008, pp. 223-238.

⑤ Hilal Ozcetin, "Breaking the Silence": The Religious Muslim Women's Movement in Turk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Studies*, Vol. 11, No. 1, 2009, pp. 106-119.

其伊斯兰复兴对女权运动的影响》等文肯定了伊斯兰复兴客观上对促进女性权利发展和扩大女性权利意识的积极影响,<sup>①</sup>认为性别问题将持续性影响土耳其国家与社会。<sup>②</sup>其四是正发党政府妇女政策及其实践研究。阿伊塞·居内斯·阿亚塔(Ayşe Gunes Ayata)等学者论述了正发党执政后推行的妇女改革政策、实践。<sup>③</sup>此外,国外学界还研究了库尔德女性主义、当代土耳其女性主义发展困境等新问题。<sup>④</sup>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外学界对该问题已有了较为丰富和深度的研究积累,但也需要进一步从宏观视野加强对土耳其女性主义整体性研究,尤其需要进行历史与现实问题相结合的思考。鉴此,本文将尝试从纵向历史视角厘清土耳其女性主义的发展演变及其内在逻辑。

## 凯末尔时期土耳其女性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土耳其女性主义思潮与运动出现了双向互动。一方面,凯末尔政府实施了自上而下的国家女性主义改革;另一方面,自下而上的民间妇女运动兴起。上述两大力量共同推动了土耳其女性主义的发展。

### (一) 土耳其国家女性主义的政策取向

国家女性主义(State Feminism)是指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土耳其凯末尔政府对旨在解放土耳其妇女的一系列妇女改革政策的总称。由于这一时期土

---

① 李艳枝:《试论土耳其伊斯兰复兴对女权运动的影响》,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5期,第132~143页。

② 刘义:《伊斯兰教与女性主义:土耳其的性别政治问题》,载《世界宗教文化》2018年第4期,第39~47页。

③ Ayşe Gunes Ayata & Fatma Tütüncü, "Party Politics of the AKP (2002 - 2007) and the Predicaments of Women at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Westernist, Islamist and Feminist Discourses in Turkey",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5, No. 3, 2008, pp. 363 - 384; Melinda Negrón - Gonzales, "The Feminist Movement during the AKP Era in Turke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52, No. 2, 2016, pp. 198 - 214.

④ Nadje Al - Ali and Latif Tas, "Reconsidering Nationalism and Feminism: the Kurdish Political Movement in Turkey",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24, No. 2, 2018, pp. 453 - 473; Cagla Diner and Şule Toktaş, "Waves of Feminism in Turkey: Kemalist, Islamist and Kurdish Women's Movement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12, No. 1, 2010, pp. 41 - 57; Simten Coşar & Funda Gençoğlu Onbaşı, "Women's Movement in Turkey at a Crossroads: From Women's Rights Advocacy to Feminism", *Journal South European Society and Politics*, Vol. 13, No. 3, 2008, pp. 328 - 344; Berna Turam, "Turkish Women Divided by Politics: Secularist Activism Versus Pious Non - Resistance",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10, No. 4, 2008, pp. 475 - 494.

其妇女社会地位的改善主要来自于国家妇女政策的推行，故被学术界称为“国家女性主义”。

国家女性主义的形成是凯末尔改革的积极结果，与凯末尔试图建构的现代土耳其民族国家计划有密切关系，土耳其妇女群体的社会解放和现代化是凯末尔改革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凯末尔总统对土耳其社会推行了全方位改革，其改革目标是通过现代化、城市化和西方化将土耳其社会型塑为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司法、教育等多个层面。

第一，土耳其政府通过立法形式提高了妇女社会地位，赋予了妇女平等公民权利。1926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Turkish Grand National Assembly）颁布了《土耳其民法典》（Turkish Civil Code），《土耳其民法典》充分体现了凯末尔改革的世俗性和现代性，土耳其研究学者认为它是凯末尔改革最具有革命性的举措之一。<sup>①</sup>《土耳其民法典》废止了奥斯曼时代的伊斯兰教法，消除了许多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男女不平等现象。其一，《土耳其民法典》赋予了妇女自由选择婚姻的权利，女性可以遵从自我意志选择与男性离婚，继承家庭财产，享有子女监护权；其二，废除了《伊斯兰家庭法》（Islamic Family Law），革除了一夫多妻制度，<sup>②</sup>这是土耳其妇女解放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其三，保障了妇女的受教育权利，受教育女性可以投身于就业市场和公共服务事业。

第二，土耳其妇女角色定位从家庭扩展至社会领域。在现代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进程中，妇女问题适时地进入公共领域，其中妇女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问题是当时社会讨论的妇女问题核心议题之一。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初期，凯末尔政府对土耳其妇女的定位包括家庭角色和公共角色两个方面。一方面，土耳其政府强调妇女家庭角色的重要性和传统性。这一时期，土耳其妇女的家庭角色主要是“母亲”和“主妇”，其核心责任是抚养家庭子女，传统的妇女家庭角色价值观被国家作为主流社会价值观广泛地推广和宣传。另一方面，土耳其政府赋予了妇女群体一定的社会公共角色，允许妇女进入

---

<sup>①</sup> Niyazi Berkes, *The Development of Secularism in Turkey*, Montreal: McGill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22.

<sup>②</sup> Kathryn Libal, “Staging Turkish Women’s Emancipation: Istanbul 1935”, *Journal of Middle East Women’s Studies*, Vol. 4, No. 1, 2008, p. 35.

公共空间领域，接受义务性公立教育，从事社会性工作。<sup>①</sup> 改变土耳其妇女传统意义上的家庭角色，既是为了满足土耳其社会现代化和西化改革的需要，也是基于土耳其妇女运动提出的诉求，此举打破了妇女被束缚于传统家庭空间的窠臼。

## （二）民间女性主义的早期实践

凯末尔当政时期，自下而上的妇女运动有力推动了土耳其妇女解放事业的发展。土耳其妇女运动的发展促成了1924年“土耳其妇女联盟”（Turkish Women's Union, TWU）的建立，形成了该国第一个全国性妇女组织。土耳其妇女联盟的创建群体主要来自于伊斯坦布尔精英妇女阶层，包括作家、医生、律师、教师等，旨在实现妇女社会地位变革等目标，且追求妇女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利。但是，土耳其妇女联盟追求妇女参政权利的诉求遭到土耳其政府的批评，土耳其妇女联盟遂将工作重点转向妇女参与公共生活，主要侧重教育事业、社会慈善等方面。这一时期，土耳其妇女联盟积极向社会贫穷妇女和儿童提供慈善援助，为女性提供教育培训。与此同时，土耳其妇女联盟仍锲而不舍地追求妇女平等的参政权利，为妇女取得地方选举权利和全国选举权利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土耳其妇女联盟还与国际妇女组织加强联系，第一次实现了土耳其妇女运动国际化的尝试。土耳其妇女联盟建立后，采取积极行动，寻求加入“国际妇女同盟”（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Women, IAW），实现土耳其妇女运动的国际化。1926年，土耳其妇女联盟的部分领导人参加了国际妇女同盟巴黎会议，并以个人名义加入国际妇女同盟，建立了土耳其妇女运动与国际妇女组织的初步联系。在土耳其妇女联盟的积极运作下，1935年国际妇女同盟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了第20次全会，实现了土耳其妇女运动国际化的重要一步，其重要性还表现在这是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在伊斯兰国家召开的国际妇女会议。国际妇女同盟伊斯坦布尔全会以“妇女自由”和“世界和平”为会议主题，与会者包括了欧美国家代表和来自土耳其、叙利亚、埃及、巴勒斯坦等中东国家代表。此次会议主题超越了普遍意义上的妇女问题，将议题延展至20世纪30年代国际社会面临的“战争与和平”议题。

---

<sup>①</sup> Sule Toktas and Dilek Cindoglu, "Modernisation and Gender: a Study of Girls' Technical Education in Turkey since 1927", *Women's History Review*, Vol. 15, No. 5, 2006, pp. 737-749.

虽然土耳其妇女运动实现了国际化的历史跨越,却在土耳其国内引发了来自男性群体的批评。部分土耳其男性精英认为,女性没有能力参与政治事务,女性角色应当以家庭事务为中心,而男性参与政治治理是自然权利。这实际上反映了土耳其社会占优势地位的父权观念根深蒂固的社会现实,妇女运动的政治和社会权利诉求及其实践对男性社会规范的挑战引发了土耳其男性精英的忧虑和不满。

无论是凯末尔国家女性主义还是民间女性主义在土耳其建国初期的发展,解放了被父权制和封建制束缚和压迫的土耳其女性,推进了土耳其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国家女性主义的积极意义在于对土耳其妇女群体推行了革命性的国家妇女政策,以世俗化和现代化的社会改革实现了土耳其妇女解放,赋予了土耳其妇女众多的公共角色和性别平等地位,以及参与社会政治的权利。国家女性主义改革使土耳其社会妇女合法的社会政治权利首次得以确认。土耳其妇女要求取得平等的社会政治权利的诉求始于二三十年代的妇女运动,女性主义领导们要求国家给予妇女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利,妇女政治参与权利诉求主要包含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当时部分土耳其妇女运动的领导人甚至提出了建立妇女政党,以政党运动形式获取合法政治权利的要求。土耳其政府为了推进妇女地位改革进程,1930年正式赋予了妇女参与地方选举的权利,1934年从地方扩大至全国选举,土耳其妇女政治权利实现了历史性突破。1935年,土耳其议会选举产生了第一批女性议员,女性议员占议员总数的4.5%。<sup>①</sup>从区域比较角度而论,土耳其妇女社会与政治权利的改善甚至早于当时大部分南欧地区国家。<sup>②</sup>

但是,囿于时代局限性和传统社会结构及其观念的延续性,这一时期土耳其女性主义的发展具有局限性。其一,虽然土耳其从法律和政策层面破除了奥斯曼时代封建社会的一夫多妻制、童婚等封建陋习,给予了妇女法律意义的平等地位,但其改革实效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而安纳托利亚等东部地区及乡村仍保留了大量不平等的妇女社会习俗和观念,土耳其社会根深蒂固的父权制传统至今仍在许多地区盛行。父权制结构的延续性来自于千百年来形成的父权道德文化体系,其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维系了土

<sup>①</sup> Gul Ceylan Tok, "The Securitization of the Headscarf Issue in Turkey: 'the Good and Bad Daughters' of the Republic", *Ritsumeikan Annu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8, 2009, p. 116.

<sup>②</sup> Simten Coşar and Funda Gençoğlu Onbaşı, *op. cit.*, p. 327.

土耳其社会的性别关系。<sup>①</sup>以1926年《土耳其民法典》为例,尽管它革命性地改善了土耳其妇女的社会地位,但也遗留了许多男女性别不平等的法律条款。《土耳其民法典》明确规定了男性作为家庭核心角色的地位,实际上将妇女归类为家庭的二等地位;《土耳其民法典》在家庭财产所有权方面,规定结婚男性的婚后财产全部归于男性个人名下,剥夺了已婚妇女分享家庭共同财产的权利,<sup>②</sup>该条款实质上否定了妇女家庭劳动的付出和成果,没有给予妇女家庭劳动与男性社会劳动平等的劳动价值承认。其二,土耳其政府虽认同妇女问题和妇女运动的必要性,但对于自下而上的妇女运动则保持警惕心理,认为这些妇女组织可能威胁土耳其国家利益<sup>③</sup>,甚至引起政治稳定问题,进而否认了妇女运动和妇女组织存在合法性,采取冻结式的行政手段迫使土耳其妇女运动陷入停滞。土耳其妇女联盟被迫于1935年解散,妇女运动进入历史低潮期。妇女问题沉默了数十年,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重新进入公共空间领域,引起土耳其社会广泛关注。其三,土耳其女性主义发展的受益者多为精英阶层女性。精英阶层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善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形成了土耳其社会妇女地位改善的整体图景<sup>④</sup>,而中下社会阶层女性仍生活于传统父权制社会环境,法律文本的变革未能从整体上改变妇女群体的境况,这也为20世纪80年代后妇女运动的觉醒提供了现实基础。

## 新社会运动视野下土耳其女性主义的分化

20世纪80年代后,土耳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改革创造了自由和宽容的社会环境,独立于国家女性主义的民间妇女运动觉醒,以新社会运动形式建立了数量众多的妇女组织。历经长期的政治动荡后,土耳其政府力推新自由主义改革,构建多党制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体系,放宽了对非政府组织的限制,

---

<sup>①</sup> A. Durakbaa, "Kemalism as Identity Politics in Turkey", in Z. F. Arat ed., *Deconstructing Images of The Turkish Wom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p. 140.

<sup>②</sup> Yesim Arat, "Women's Rights and Islam in Turkish Politics: The Civil Code Amendment",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4, No. 2, 2010, p. 236.

<sup>③</sup> Yesim Arat, "From Emancipation to Libe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4, No. 1, 2000, pp. 107 - 123.

<sup>④</sup> Berna Turam, "Turkish Women Divided by Politics",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10, No. 4, 2008, p. 479.

自由的社会环境为土耳其妇女运动觉醒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至80年代中期,土耳其出现了库尔德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伊斯兰主义(Islamism)、女性主义、阿拉维文化运动(Alevi Cultural Movement)、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sm)等多种形态的新社会运动思潮,<sup>①</sup>相较于六七十年代土耳其国内意识形态纷争,新社会运动呈现出全然不同的行为主体、价值观念、动员形式和思潮内涵。

### (一) 世俗女性主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土耳其世俗女性主义(Secular Feminism)思潮及运动的核心是追求男女平等权利。这一时期土耳其妇女运动存在多种组织形式和动员方式,独立性和多元性的妇女运动促进了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第一,土耳其妇女运动产生了不同以往的集体行动方式。1987年,3000名伊斯坦布尔女性以集体动员方式参与了集会游行,表达了对土耳其妇女受暴力现象的愤怒和集体抗争的意愿。<sup>②</sup>此次集体抗争事件有着深远的社会意义:它是土耳其妇女第一次以集体抗争表达对妇女权利的诉求,标志着土耳其妇女运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标志着土耳其妇女运动由个人权利诉求转向为集体权利诉求,妇女问题不再是个人或家庭内部事务,而是土耳其社会妇女的集体诉求。受土耳其妇女运动和女性政治家的影响,1990年,土耳其劳动与社会安全部组建了“妇女地位与问题总局”(Directorate General on the Status and the Problems of Women)<sup>③</sup>,以制度化形式推进了土耳其妇女事业的发展。

第二,土耳其妇女集体发起“紫针运动”(Purple Needle Campaign),以期通过社会运动方式消除部分歧视女性的不平等社会政策或现象。“紫针运动”主要针对土耳其社会长期存在的在公共交通运行中的性骚扰女性现象,该运动从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和安卡拉等大中城市中逐渐发展壮大。参与者进而要求土耳其政府和民众正视妇女受暴力和受歧视的社会现象,她们通过递交请愿书、举行集会游行、召开记者招待会、开展国会游说等多种途径,试图改变土耳其法律和法庭对妇女的歧视现象。在“紫针运动”影响下,土耳其于1990年废除了妇女就业需经丈夫批准的父权霸权等法律规定,1997年

<sup>①</sup> Sefa Fiimfiek,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Turkey Since 1980”, *Turkish Studies*, Vol. 5, No. 2, 2004, p. 112.

<sup>②</sup> Cagla Diner and Şule Toktaş, *op. cit.*, p. 45.

<sup>③</sup> Sefa Fiimfiek, *op. cit.*, p. 125.

批准了已婚女性保留姓氏的相关法律权利，1998 年废除了女性婚外情为刑事犯罪的法律条文，还给予警察部门合法干预女性受家庭暴力的法律权利。<sup>①</sup>

第三，这一时期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妇女组织，妇女组织以多种方式推进妇女事业的进步，积极保护妇女权益，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其一，推动妇女事业的社会宣传。1990 年，伊斯坦布尔妇女组织建立“妇女图书馆”（Women Library），推动土耳其社会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宣传妇女运动和妇女问题。其二，土耳其妇女组织建立了许多机制化的咨询中心和妇女庇护所，保护受暴力困扰的女性。1990 年，土耳其妇女组织建立“紫色屋顶基金会”（Purple Roof Foundation），设立热线电话，向遭受家暴的女性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法律咨询和妇女庇护所。据不完全统计，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末，土耳其妇女组织数量由 64 个增加至 350 多个。<sup>②</sup>

土耳其妇女运动再觉醒后，要求修改《土耳其民法典》的呼声日渐高涨。80 年代，土耳其妇女组织中的“土耳其妇女法学家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Turkish Women Jurists）提出“废止《土耳其民法典》部分条款的修改和部分条款”（Amendment of some of the Articles and Annulment of some Articles of the Civil Code）的草案，<sup>③</sup>其要义是坚持女性和男性在婚姻中具有平等权利的原则。此外，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妇女研究中心”“妇女图书馆”“紫色屋顶基金会”等妇女组织及妇女专家学者，共同发起和参与了民法修正案的请愿运动，要求实现土耳其的性别平等，消除性别歧视。1993 年 2 月，共计 11 900 份签名被递交给土耳其大国民议会；1995 年，在“《土耳其民法典》纪念仪式”等活动中，土耳其妇女组织打出了“平等权利 - 平等参与”“家庭民主 - 社会民主”“公民国家 - 公民法”等旗帜。

土耳其妇女组织相关社会运动，促使土耳其司法委员会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制定修正案，推进了民法修正案的发展进程。2001 年 9 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正式通过了对 1926 年《土耳其民法典》的修正案，使土耳其在消除性别歧视和促进性别平等方面实现了跨越性的进步。其一，2001 年民法

---

① 当时，土耳其法律和法庭判例对妇女歧视的内容包括：女性需经过丈夫同意方可就业工作；女性必须使用丈夫姓氏作为自己的姓氏；男性是家庭权威等。Yesim Arat, “Rethinking the Political: a Feminist Journal in Turkey, Pazartesi”,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Vol. 27, No. 3, 2004, pp. 281 - 282.

② Cagla Diner and Şule Toktaş, op. cit., p. 47.

③ Yesim Arat, “Women's Rights and Islam in Turkish Politics: The Civil Code Amendment”, p. 240.

修正案取消了男性在家庭核心地位的角色规定，从法律文本层面历史性突破了土耳其社会父权制观念的传统，给予了土耳其男女家庭地位平等的合法性依据。其二，此次民法修正案给予了土耳其已婚妇女共享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承认了已婚妇女家庭劳动价值和男性社会劳动价值的平等性。土耳其妇女离婚后可分配结婚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该法条的修订给予了离异妇女法律文本和物质层面的保护，有效提高了妇女的自主独立性和婚姻自决性。

## （二）伊斯兰女性主义

伊斯兰女性主义是新社会运动产生后与世俗女性主义有相当差异和部分对立观念的宗教类型女性主义思潮，其产生与土耳其社会深厚的伊斯兰文化传统有根本性的逻辑联系，而伊斯兰女性主义的公共化和政治化，是头巾禁令的世俗主义政治引发的直接后果。伊斯兰女性主义就内涵而论，其核心思想是穆斯林妇女的不平等社会地位不是伊斯兰文化创造的结果；伊斯兰文化内涵包括了性别平等和女性权利概念，“穆斯林妇女问题源于乌来玛（伊斯兰学者）对《古兰经》和圣训的父权式解释，以及伊斯兰社会长期的父权制实践。该思潮致力于对《古兰经》和圣训重新解释，追求建构一个更平等和更公正的伊斯兰社会。”<sup>①</sup>

土耳其伊斯兰女性主义萌发于20世纪60年代宗教虔诚派妇女进入公共空间和现代教育系统。50年代土耳其一党制解体后，民主化和政治生态自由化促使多党制和非政府组织发展，宗教组织重新进入公共空间领域，共和国早期著名的宗教学者赛义德·努尔西（Said Nursi）和苏莱曼·图纳汗（Süleyman Tunahan）的追随者建立了伊斯兰色彩的非政府组织“努尔库”（Nurcus）和“苏莱曼齐”（Suleymancıs）。努尔库等宗教组织受到土耳其现代化的影响，提倡现代科学和教育，主张伊斯兰框架内的性别平等，鼓励土耳其妇女接受现代科学教育。<sup>②</sup>这一时期，许多宗教虔诚派妇女进入土耳其现代世俗教育学校上学，虽然土耳其共和国没有明确的立法禁止妇女穿戴头巾进入学校，实际上宗教虔诚派女学生佩戴头巾进入学校受到了教育系统和国家机构的限制和反对。70年代土耳其政治动荡时期，头巾问题日益成为凯末尔

<sup>①</sup> 范若兰：《伊斯兰女性主义研究》，载《宗教社会学》2016年第4辑，第348页。

<sup>②</sup> Ömer Çaha, “Islamic Women’s Movement in Turkey: From Street Actions to Islamic Feminism”, *2nd Annual Conference Papers of Islam and Liberty Network*, May 2013, p. 2.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00-vHkefStiUjdVeENUVFNOBTg/edit?usp=sharing>, 2019-02-10.

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之间争论的核心议题之一。伊斯兰女性主义认为，头巾问题不属于政治争议范畴，更不会破坏土耳其世俗主义国家原则；相反，头巾禁令的解除有益于宗教虔诚派妇女群体进入公共空间，接受世俗化教育，服务于国家，弥合土耳其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断裂。

由于土耳其政府头巾禁令的推行，伊斯兰女性主义群体逐渐在公共领域被具有政治伊斯兰倾向的政党所关注。至90年代中期，伊斯兰女性主义者已成为土耳其繁荣党（Welfare Party, RP）的选票群体基础。头巾问题的争议政治化，使伊斯兰女性主义也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土耳其世俗政治与伊斯兰政治的意识形态冲突。

90年代后，伊斯兰女性主义群体先后建立了多个民间妇女组织，以妇女组织的社会运动形式争取头巾禁令的解除和宗教虔诚派妇女合法权利，呈现出高度组织化的发展趋势。伊斯兰女性主义妇女组织的主要代表为“妇女反歧视权利协会”（Association for Women's Rights against Discrimination, AWRD）、“首都妇女平台”（the Capital City Women's Platform）和“彩虹妇女协会”（Rainbow Women's Association）等。

伊斯兰女性主义以妇女组织形式表达了自身的妇女权利诉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其一，强调妇女在信仰方面的虔诚性以及社会生活、价值观方面的传统性。伊斯兰女性主义者大多坚持虔诚的伊斯兰信仰，按时完成宗教礼拜，以传统方式实践社会和个人生活，家庭观念表现为传统倾向。由此，伊斯兰女性主义以宗教角度将自身与世俗女性主义划分了界限，强调其与世俗女性主义和自由女性主义的区别，形成了伊斯兰女性主义话语体系。其二，伊斯兰女性主义主张性别平等，反对以伊斯兰教义为名，行性别歧视之实，强调妇女的家庭角色，也鼓励妇女参与社会角色和公共生活，反对家庭暴力。<sup>①</sup> 伊斯兰女性主义也赞同世俗和自由女性主义提出的父权制的男性霸权思想，主张突破传统父权制对妇女的束缚和歧视，消除男权主义观念。其三，伊斯兰女性主义认为穆斯林女性属于第三世界女性，不同于西方文明体系的女性主义思潮，对于人权、文化、性别都有不同的衡量标准和立场。在伊斯兰女性主义看来，土耳其头巾仅仅代表着传统文化饰物含义，与世俗主

---

<sup>①</sup> Valentine M. Moghadam, "Islamic Feminism and its Discontents: Toward a Resolution of the Debate",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27, 2002, p. 1135.

义没有违背之处,从自由主义和人权角度而论,土耳其妇女是否佩戴头巾也是依托于个体主义价值观的自由选择。

1997年2月28日,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mmittee, NSC)授权军方以“后现代政变”(Post-Modern Coup)形式停止了联合政府的存在,解散了执政的土耳其繁荣党,随即颁布了土耳其历史上最为严厉的头巾禁令,大学和中学教育系统中数万名女性学生被迫离开学校。严格的头巾禁令使原本宗教象征的头巾宗教文化传统演变为了世俗主义原则与政治伊斯兰之间的矛盾焦点,在国家机构和教育系统佩戴伊斯兰头巾都被视为是对国家世俗主义宪法原则的对抗。<sup>①</sup>1997年头巾禁令的严格推行不仅加剧了土耳其国内世俗派和政治伊斯兰势力之间的矛盾,也沉重打击了伊斯兰女性主义的平等诉求。进入21世纪初之后,头巾禁令成为土耳其伊斯兰倾向政党参与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话语对象,围绕着是否应解除头巾禁令引发了女性主义者内部日益激烈的争论。

### (三) 库尔德女性主义

族群民族主义因素是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土耳其女性主义思潮演进的另一个重要变量。自20世纪20年代土耳其妇女运动兴起后,妇女运动一直被认为是无族群差别的社会运动,没有体现土耳其不同民族、宗教、文化、阶层妇女群体社会地位与利益诉求的差异性。<sup>②</sup>凯末尔时期试图构建以“一族一国”为经典模式的现代土耳其民族国家,忽视了土耳其国家多元族群、文化、宗教等复杂性社会结构。传统意义上的土耳其妇女运动以土耳其民族、中上社会阶层、西式教育背景、城市化的妇女群体为主体,虽然她们在国家女性主义和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妇女运动中启蒙了妇女群体的权利意识,提高了土耳其妇女的社会地位,改善了妇女受教育水平,却忽略了土耳其其他族群妇女群体的声音。

库尔德妇女运动的产生深深根植于土耳其社会库尔德族群妇女面临的边缘化地位和不平等歧视等历史性和现实性社会背景。第一,库尔德妇女运动的兴起源于库尔德女性在土耳其社会面对的父权制传统的压迫。土耳其库尔德民族运动实质是库尔德男性为主体的民族主义思潮与政治实践,库尔德社

<sup>①</sup> 笞涛:《延续与变迁:当代土耳其的政教关系》,载《西亚非洲》2018年第2期,第45页。

<sup>②</sup> Omer Çaha, “The Kurdish Women’s Movement: A Third-Wave Feminism Within the Turkish Context”, *Turkish Studies*, Vol. 12, No. 3, 2011, p. 438.

会顽固的父权制文化排斥和抗拒库尔德女性对平等社会地位的追求，库尔德文化的男权至上思想根深蒂固，因而库尔德民族运动使库尔德妇女群体处于边缘化态势。虽然凯末尔主义现代化改革给予了土耳其妇女平等的法律地位，但土耳其东部地区的库尔德妇女群体仍处于传统社会父权结构的束缚中，法律层面的妇女解放并未解决现实性的库尔德妇女问题。土耳其东部库尔德人聚居区的传统父权制结构的显著特征是部落性和宗教性，<sup>①</sup> 库尔德妇女的实际社会地位远远低于发达地区妇女群体，其女性权利并未得到实际保障，该地区库尔德妇女面临着诸如童婚、荣誉谋杀、家庭暴力、教育匮乏等困境。

第二，凯末尔时代现代化改革进程使库尔德妇女在土耳其社会日益边缘化。相比于土耳其族裔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库尔德妇女在社会边缘化中受到了两个方面的消极影响：一是库尔德妇女的民族认同危机，二是相对贫困的社会生活及受教育低水平。<sup>②</sup> 由此，库尔德妇女群体日益被禁锢于社会下层甚至底层，还面临着丧失民族性的认同危机。以受教育水平为例，根据 1993 至 1998 年“土耳其人口与健康调查”（Turkish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 TDHS）显示，超过 70% 的土耳其库尔德女性未能完成初等教育学业，而土耳其族裔女性相应的未完成比例仅为 22%；土耳其库尔德女性完成中等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仅为 0.5%，相应情况的土耳其族裔女性为 5%。<sup>③</sup>

第三，传统土耳其妇女运动的土耳其族群特征使土耳其妇女运动拒绝承认库尔德妇女的少数民族特性，库尔德群体妇女既不能融入土耳其妇女运动的主流，也得不到土耳其主流妇女运动对其特殊的妇女权利诉求的承认。因此，双重歧视和女性、族群的复杂性身份认同促使土耳其库尔德妇女群体迈向了独立性新社会运动，既不同于传统妇女运动，也异于传统民族主义路径的政治运动。

第四，库尔德妇女运动的兴起与当时土耳其政治发展进程存在密切关系。其一，部分库尔德妇女积极参与了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土耳其社会左翼运动，使库尔德妇女积累了社会运动经验，由于当时左翼运动以男性为主导，事实

---

<sup>①</sup> J. B. White, "State Feminism, Modernization, and the Turkish Republican Woman", *NWSA Journal*, Vol. 15, No. 3, 2003, p. 157.

<sup>②</sup> Metin Yüksel, "The Encounter of Kurdish Women with Nationalism in Turke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2, No. 5, 2006, p. 777.

<sup>③</sup> A. Gundiiz - Hogor and J. Smits, "Intermarriage between Turks and Kurds in Contemporary Turkey",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8, No. 4, 2002, p. 424.

上库尔德妇女的性别特征被忽视了。其二，80至90年代的土耳其库尔德民族运动提升了库尔德妇女参与政治活动、公共生活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在土耳其库尔德人为自身民族权利而广泛地进行政治活动期间，部分库尔德妇女产生了从民族运动转向为妇女权利运动的思想转型。其三，80年代后土耳其妇女运动的再觉醒唤起了库尔德妇女沉睡的性别认同意识，使库尔德妇女将利益诉求从狭窄的族群或意识形态领域延展至性别认同领域，库尔德女性别认同意识觉醒促生了库尔德妇女运动和组织的形成。

虽然土耳其妇女运动促进了库尔德女性别认同意识的觉醒，在族群界限的差异和民族问题的不同立场等因素作用下，库尔德妇女形成了有别于传统土耳其妇女运动的独立性组织和妇女运动模式。1989年前后，库尔德妇女群体多次通过集体抗争形式向公共领域和土耳其妇女组织表达了库尔德民族语言权利的诉求，而土耳其妇女组织不仅忽视了库尔德妇女群体民族语言权利的要求，还指责库尔德妇女的民族主义立场。由此，库尔德妇女群体与土耳其民族背景的妇女组织产生了组织分化，1990年建立了第一个独立性的库尔德妇女组织“库尔德妇女团体”（Kurdish Women Group, KWG）；1991年建立了“爱国妇女联盟”（Patriotic Women's Union, PWU）。“库尔德妇女团体”和“爱国妇女联盟”标识了土耳其库尔德妇女运动双重认同特征的不同趋向：“库尔德妇女团体”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和性别认同，“爱国妇女联盟”突出其对库尔德运动的民族诉求。但是，库尔德妇女运动的组织化运作被土耳其政府多次取缔和监控，被迫在伊斯坦布尔等城市转入地下运行和频繁更名。<sup>①</sup>

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库尔德妇女运动的女性诉求与库尔德问题引发的武装冲突后果紧密相关。土耳其政府与库尔德斯坦工人党（Kurdistan Workers Party, PKK）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使许多库尔德妇女卷入政治斗争。一方面，因家人被捕或失去生命的库尔德女性积极参与了库尔德妇女运动，以母亲或妻子的家庭成员角色参与妇女权利斗争；另一方面，许多库尔德妇女受到政治紧张化和社会冲突的影响，转而投身于支持库工党的库尔德运动；部分库尔德妇女加入“人民民主党”（People Democracy Party, PDP），以参与政党政

---

<sup>①</sup> Azizoglu Bazan, "The Kurdish Women's Movement in Turkey and the Adventure of Becoming Visible", *Blickwechsel: Studien zur zeitgenössischen Türkei*, September, 2017, p. 3, [https://www.blickwechsel-tuerkei.de/download/Forschungsergebnisse/Frauenbewegungen/englisch/III.2.B.Azizoglu-Bazan\\_ENG.pdf](https://www.blickwechsel-tuerkei.de/download/Forschungsergebnisse/Frauenbewegungen/englisch/III.2.B.Azizoglu-Bazan_ENG.pdf), 2019-01-10.

治方式争取库尔德女性权利。

90年代后，土耳其库尔德妇女运动逐渐与旅欧库尔德社群产生联系，并与西方国家的妇女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当时，土耳其库尔德女性主义者创建了许多妇女问题杂志，宣传对于土耳其国家女性主义的批判，部分旅欧库尔德女性主义者在伦敦和柏林等城市建立了旅欧库尔德妇女组织，如伦敦库尔德社群的“罗贾妇女协会”（Roj Women's Association）等。跨国库尔德妇女组织还与西方左翼、少数民族和黑人妇女等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发起“妇女正义”（Justice for Women）、“停止荣誉谋杀”（Stop Honour Killings）等妇女运动。<sup>①</sup>

土耳其库尔德妇女运动兴起于土耳其社会的公共领域，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妇女运动，具有双重的社会意义。首先，土耳其库尔德妇女运动向传统库尔德社会文化中的父权制提出了批判，要求打破库尔德父权制传统对库尔德妇女权利的限制与束缚，改善库尔德妇女的社会地位。其次，库尔德妇女运动对传统土耳其女性主义思潮与运动提出了质疑，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土耳其女性主义忽视了库尔德问题以及库尔德妇女问题。库尔德妇女运动打破了传统土耳其妇女运动的话语霸权，指出了传统土耳其妇女运动的土耳其族群、城市背景、中上社会阶层的基本特征。因此，土耳其库尔德妇女运动实质上突破了传统妇女运动的局限性，从族群身份认同角度阐释了库尔德妇女权利诉求，批判了传统妇女运动对少数民族妇女权利的忽视，将土耳其妇女运动上升到族群意义层面，使土耳其妇女运动从一元化演变为多元化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其他不同族群背景的土耳其女性还产生了跨族群意识的普遍性妇女问题共识，不同族群、信仰、阶层的妇女群体逐渐形成了超越狭隘身份认同的组织、运动和观念。1997年，土耳其迪亚巴克尔（Diyarbakir）建立了跨族群的妇女组织——“支持妇女候选人协会”（Association of Support for Women Candidates）。目前，“支持妇女候选人协会”在土耳其东南部和东部等地域23个省份共建有分支机构共40余个。<sup>②</sup>“支持妇女候选人协会”不强调自身意识形态归属，突出跨族群、跨阶层、跨

---

<sup>①</sup> Nadjé Al - Ali and Latif Tas, “Clashes, Collaborations and Convergences: Evolving Relations of Turkish and Kurdish Women's Rights Activists”,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20, No. 4, 2018, p. 523.

<sup>②</sup> Nadjé Al - Ali and Latif Tas, *op. cit.*, p. 528.

信仰的特质，致力于解决性别暴力问题，为土耳其社会解决妇女问题和争取妇女权利而奋斗。

综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土耳其女性主义进入了历史性的大发展时期，各种女性主义思潮以非政府组织形式开展社会运动，取得了积极成果，对于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和维护妇女权利作出了贡献，充分体现了民主化、多元化时代土耳其非政府组织的社会治理功能和性别平等化趋势，有力推进了土耳其妇女解放事业的进步。这一时期也是土耳其女性主义思潮的分化阶段，宗教与世俗、族群边界等因素成为女性主义思潮不同流派分化的主导性因素。

## 正发党时代土耳其女性主义的激烈论争

进入21世纪以来，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将解决妇女问题作为国家政治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尤其聚焦妇女参政问题。这引起女性主义者与政府及其内部派别的矛盾加深，围绕女性主义问题的争论日趋激烈。

### （一）正发党政府对妇女问题的传统观念

研究和分析土耳其正发党时代的妇女问题，需要以正发党的意识形态和执政理念作为切入点，这是影响当代土耳其妇女问题走向的关键变量之一。2001年建立的土耳其正发党，秉持“保守民主”（Conservative Democracy）理念，在意识形态领域强调土耳其社会传统与变革之间的协调，注重土耳其传统社会与现代性的中间路线，批判革命意识形态和激进改革对土耳其社会传统价值观念体系的破坏。因此，土耳其正发党的社会观侧重推行渐进式社会变革，充分汲取和保护传统社会的思想文化遗产、价值观念体系。正发党认为土耳其社会传统存在三个方面的核心要素，分别是“家庭”“伊斯兰教”和“道德观”。

第一，正发党的保守主义民主理念突出将家庭观念作为土耳其传统社会的核心。正发党认为家庭和家庭观念是保守主义民主的核心思想，而作为社会机制的家庭是维持土耳其社会传统和价值观念体系的主要载体。家庭观念的弱化将成为威胁和破坏土耳其社会传统和价值观念体系的根源，因此，正发党的政策取向体现为致力于推进土耳其社会的家庭观念建构和保护，反对土耳其社会和家庭观念的全盘西化。

第二，正发党充分肯定了土耳其的伊斯兰文明遗产，强调土耳其认同中的伊斯兰文化，转变了凯末尔时代确立的世俗主义和西方文化认同倾向，重回土耳其传统文化认同观念。虽然正发党强调伊斯兰文化认同，但反对宗教文化认同的制度化，拒绝宗教与政治的结合性，而是把传统宗教文化作为构建正发党保守民主理念的文化认同资源，促进土耳其的社会秩序稳固和传统价值观念体系的恒定性。

第三，正发党强调道德观念对社会传统维持的构建功能，即在土耳其建设“道德正统社会”（Morally Upright Society），道德正统社会以伊斯兰道德文化观念为基础。正发党认为妇女在土耳其建设道德正统社会进程中扮演核心角色，母亲这个角色通过家庭为土耳其下一代传输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念。

由此，正发党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将家庭、妇女、社会价值观念体系等传统作为施政之重点，正视妇女问题和提高妇女社会地位是践行社会传统价值观的重要体现。除此之外，在土耳其，还有两方面因素促使正发党执政府推动妇女问题改革。一是虽然土耳其妇女政治参与的意识并不十分强烈，但正发党无论是参与地方选举或国家选举，女性选民都是其政治动员的对象；正发党女性党员占有相当大比例，也是其主动参与妇女问题改革的动力之一。二是正发党执政后恰逢土耳其加入欧盟进程启动之时，入欧进程的关键之一即要求土耳其改善国内妇女权利状况。

## （二）正发党政府的妇女权益改革举措

首先，在法律层面调整涉及妇女问题的相关规定。其一，正发党执政后积极推行宪法修正案，旨在促进妇女权利和两性平等。通过修宪提案之后，土耳其宪法第十条明确规定了政府对妇女赋有保护责任，<sup>①</sup> 强调土耳其女性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宪法第 90 条的修改使土耳其正式接纳了保护妇女权利的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正式被纳入土耳其国家认可的法律体系规范之中。其二，正发党政府设立“家庭法庭”，以处理与《土耳其家庭法》相关的妇女问题，延长妇女带薪产假时间，保护妇女权利。其三，正发党政府废除了《土耳其刑法》存在激烈争议的强奸嫌犯赦免条款，

---

<sup>①</sup> Zana Çıtak and Özlem Tür, “Wom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Change: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Experience in Turke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4, No. 3, 2008, p. 456.

即强奸女性的男性即使与受害者结婚，依然要被判处刑罚。

其次，正发党内部建立“正发党妇女部”（Women Branches of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WBJDP），用于推进土耳其妇女问题的改革。“正发党妇女部”组建于2003年2月，在国内81个省份有下属分支机构，垂直组织体系可延伸至县级行政单位<sup>①</sup>，每月在首都安卡拉召开妇女部全国会议，商讨相关妇女问题。由此，正发党妇女部在土耳其国内拥有了相当深厚的妇女群众基础和参与社会治理的经验，突出体现在社会援助方面。妇女部工作人员深入土耳其社会基层，援助贫穷、年迈和残疾人妇女群体，她们向困难妇女群体提供免费餐食、各类咨询，对生活困难的妇女家庭子女提供教育援助资金。

再次，在行政机构层面专设“地方政府部”（Local Government Department），推动妇女参政议政。正发党的“地方政府部”职责之一是推动土耳其妇女参与地方政府事务，鼓励正发党女性党员参选市长和省县级议会代表。“推广与媒体事务部”（Promotion and Media Affairs Department）通过现代媒体向土耳其妇女宣传正发党的妇女观和妇女问题政策，组织会议和公共讨论，发布妇女问题的宣传手册；“组织事务部”（Organizational Affairs Department）负责全面落实土耳其各省、县级的“正发党妇女部”分支组织建设工作。因此，正发党鼓励和支持妇女群体践行土耳其法律赋予女性的合法参政权利，由此提高了土耳其妇女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因此取得了妇女群体对正发党的选举支持。正发党的妇女政策是该党自2002年以来占据土耳其政坛中心地位的关键因素之一。

此外，正发党政府在土耳其全国5万人以上的城镇全面建立保护妇女与儿童的庇护中心，健全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网，保护受暴力威胁的妇女儿童。

### （三）正发党妇女问题改革的社会反响

虽然正发党执政后积极改善妇女地位，调整了许多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和政策，但其执政理念和意识形态的中右派倾向及保守民主理念促使其复归于土耳其社会传统价值观念体系，在一些相关妇女问题的政策制定和实践方面引起了土耳其社会内部的激烈争论。

第一，政府与民间女性组织对保障妇女人身权利和妇女参政权存在争议。

---

<sup>①</sup> Ayşe Gunes Ayata and Fatma Tütüncü, “Party Politics of the AKP (2002 - 2007) and the Predicaments of Women at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Westernist, Islamist and Feminist Discourses in Turkey”,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5, No. 3, 2008, p. 370.

其一，在维护妇女个体权利问题上，以土耳其刑法中的通奸罪修改为例。2004年9月，正发党政府在刑法修正案中恢复了土耳其刑法中的通奸罪条款，宣布通奸罪重新适用于有通奸行为的男性和女性，将通奸行为重新从民法纳入刑法体系。<sup>①</sup> 正发党政府宣称刑法通奸罪修正案是土耳其社会传统价值观念体系的体现，尊重了男女性别平等的现代性理念。然而，刑法通奸罪修正案引起了土耳其社会许多独立性妇女组织的强烈抗议，而欧盟在土耳其加入欧盟进程的谈判和考察阶段，也对土耳其刑法修正案提出了批评。

其二，正发党政府与土耳其妇女组织的另一个关键性争论是“性别配额制”（Gender Quota）。以“支持妇女候选人协会”（Association of Support for Women Candidates）为代表的妇女组织认为，土耳其妇女缺乏政治参与的根源不是妇女对政治生活的漠视或受累于家庭，男性政治霸权是女性远离土耳其政治的主要障碍。<sup>②</sup> 因此，妇女组织要求在土耳其推行性别配额制，给予土耳其女性在政党政治、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中分别拥有30%比例的政治权利配额<sup>③</sup>，以此打破土耳其男性对政治决策和运行体制的性别垄断地位。但是，正发党政府并不支持在土耳其推行“性别配额制”，而是主张通过妇女部或其他社会组织加强对土耳其妇女的民主政治教育，启蒙土耳其女性的参政意识。

当代土耳其妇女运动提出的性别配额制诉求，实质上是涉及土耳其政治结构变革的重大政治体制问题。一般意义上的土耳其妇女运动斗争目标主要是以性别平等为核心，促进妇女社会地位之改善，提高妇女参与社会政治事务的意识和权利，改变家庭和社会中存在的传统父权制观念。相较而言，“性别配额制”的提议试图改造土耳其各群体的政治结构，这是一种全新的政治思潮，是对土耳其国家与社会的挑战。

其三，头巾禁令的论争是当代土耳其社会国家与妇女组织、女性主义组织内部之间争议最为激烈的难题。与伊斯兰女性将头巾视为宗教文化习俗不同，土耳其世俗女性主义者认为头巾服饰文化集中体现了政治伊斯兰的文化象征，与土耳其国家世俗主义原则和人权原则不符。这造成土耳其社会内部的激烈争论，这一论争深刻反映了土耳其社会宗教、世俗和女性主义思潮不同派别间的尖锐矛盾和对立观念。对此，2002年正发党执政后，试图通过立

<sup>①</sup> Zana Çıtak and Özlem Tür, *op. cit.*, p. 461.

<sup>②</sup> Ayşe Gunes Ayata and Fatma Tütüncü, *op. cit.*, p. 375.

<sup>③</sup> Simten Coşar and Funda Gençoğlu Onbaşı, *op. cit.*, p. 334.

法取消头巾禁令，曾被宪法法院宣告违反世俗主义原则而驳回，但是正发党尝试推动取消头巾禁令的进程并没有停止。2008年2月，正发党推动议会取消了大学头巾禁令，结束了土耳其教育系统对头巾服饰着装的严厉限制，<sup>①</sup>宗教虔诚倾向的土耳其女性群体得以回归校园。2013年10月，正发党推动议会取消了国家公务员系统的头巾禁令，行政、立法等国家机构女性公职人员可佩戴头巾工作<sup>②</sup>；土耳其议会4名女性议员佩戴头巾出席了安卡拉议会活动，标志着土耳其议会机构头巾禁令的历史终结。<sup>③</sup>2017年2月，正发党政府推动议会解除了土耳其军队中女性军官、女性士兵的头巾禁令，这也标志着土耳其所有国家部门系统解除了头巾禁令。<sup>④</sup>正发党政府历时多年冲破了土耳其世俗主义体制下的头巾禁令，对土耳其社会和政治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也是土耳其女性主义运动发展的分水岭，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象征意义。

第二，世俗女性主义者与伊斯兰女性主义者对于性别平等、家庭等观念和女权运动方式持不同观点。其一，世俗女性主义者与伊斯兰女性主义者在“性别平等”观念上存在显著的分歧。世俗女性主义者认为，土耳其社会现存的男女性别角色、责任和权利的差异源于父权制社会对妇女的压迫，这些差异并非是性别不同而是历史惯性。<sup>⑤</sup>土耳其伊斯兰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性和女性存在先天的性别差异，因而形成了不同性别的角色、责任和权利；虽然男、女性别差异存在，但性别父权等级制并非现实。

其二，对于正发党倡导的传统家庭观及妇女在其中的角色，世俗女性主义者和伊斯兰女性主义者存在差异。世俗女性主义者认为，传统家庭观念和

---

<sup>①</sup> Gareth Jones and Hidir Goktas, “Turkey Lifts University Headscarf Ban”, *Reuters*, February 9, 2008, <https://uk.reuters.com/article/uk-turkey-headscarf/turkey-lifts-university-headscarf-ban-idUKL0967026720080209>, 2019-02-10.

<sup>②</sup> “Turkey Lifts Islamic Headscarf Ban in Civil Service”, *The Telegraph*,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turkey/10363821/Turkey-lifts-Islamic-headscarf-ban-in-civil-service.html>, 2019-01-22.

<sup>③</sup> “Turkey’s Female MPs Wear Headscarves in Parliament for the First Time”, *The Guardian*, 31 Oct. 2013,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oct/31/turkey-female-mps-headscarves-parliament-end-ban>, 2018-12-29.

<sup>④</sup> “Turkey Lifts Military Ban on Islamic Headscarf”, *The Guardian*, 22 Feb.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feb/22/turkey-lifts-military-ban-on-islamic-headscarf>, 2019-01-02.

<sup>⑤</sup> Seda Demiralp, “Divisions between Feminists and Islamist Women’s Rights Activists in Turkey”, *Hurriyet Daily News*, March 13 2018,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opinion/seda-demiralp/divisions-between-feminists-and-islamist-womens-activists-in-turkey-128633>, 2018-12-19.

女性家庭角色束缚了女性自由，不能强制让女性从事家务劳动，女性成为“妻子”和“母亲”不应当是妇女必须履行的社会角色，女性应当拥有性自由和婚姻自由。伊斯兰女性主义的家庭观念非常接近于正发党保守民主主义思想，强调和鼓励女性接纳婚姻和生子，并视之为妇女天然的责任。当然，无论是世俗女性主义者，还是伊斯兰女性主义者，都提倡两性平等，反对家庭暴力等侵犯妇女权利的社会现象。

其三，对于妇女权利改善方式，世俗女性主义与伊斯兰女性主义表现为积极与保守的不同趋向。世俗女性主义者是当代土耳其新社会运动核心力量之一，她们主张以非政府组织力量推动土耳其社会的性别平等化。与之相反，土耳其伊斯兰女性主义群体希冀通过温和、渐进的方式，促进妇女权利与社会地位之改善。

第三，鉴于库尔德问题关涉土耳其统一的民族国家建构，库尔德女性组织的参政行为面临土耳其世俗女性主义者的严重质疑。虽然库尔德妇女运动与土耳其世俗女性主义群体之间存在女性主义的共同观念，但库尔德族群身份认同和库尔德问题的民族诉求成为两个不同族群之间女性主义者建立合作机制和形成共识的主要障碍。如前文述及，库尔德妇女运动批判世俗女性主义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倾向和对女性主义话语的霸权地位；土耳其世俗女性主义者则认为，库尔德女性主义者的思想和诉求超越了一般意义的性别平等议题，以族群身份认同取代了性别认同，导致了土耳其女性主义的分裂。世俗女性主义组织“妇女联盟”（Women Coalition）的代表曾坦言，“虽然库尔德妇女运动与女性主义思潮有一定契合之处，但实际上库尔德妇女运动自我定义的关键点不同于女性主义的。”<sup>①</sup> 甚至部分世俗土耳其女性主义者认为，库尔德妇女运动实质上不属于女性主义范畴。不论世俗女性主义对库尔德妇女运动性质的评价是否准确，土耳其社会中存在的民族偏见与族群边界加深了土耳其女性主义群体的分化趋势和边界意识，阻碍着不同族群、不同背景的女性主义者建立更广泛和牢固的合作基础。

总之，正发党执政以来的妇女政策和改革举措已部分冲击了凯末尔时代确立的国家女性主义政策，头巾禁令的全面取消促使伊斯兰文化符号象征复归于公共领域，而伊斯兰女性主义者无疑是正发党保守民主主义妇女政策的

---

<sup>①</sup> Azizoglu Bazan, op. cit., p. 6.

最大受益者。当代土耳其女性主义者，依据不同派别、身份背景或意识形态，对于女性相关问题缺乏可以相互包容理解的共识。派别化和分散化的女性组织，尽管体现了其多元性，却使维护女性共同权益的事业发展受到一定制约。

## 结 论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近百年来，现代土耳其女性主义思潮与运动先后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的发展演变，与土耳其政治发展存在密切关系。

凯末尔改革时代是土耳其国家与社会现代化的转型时期，政治现代化与社会世俗化为土耳其女性解放提供了基本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改革动力。一方面，这一时期土耳其女性主体意识尚未觉醒，自上而下的凯末尔国家女性主义改革使土耳其女性从法律、政治方面获得了平等地位，妇女在法律、政治层面的地位变化和社会现实权利的改善来自于国家主导的全面改革运动；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政治威权主义极大地限制了独立自主的民间女性主义自由发展，因而较多保留了土耳其性别关系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和父权社会结构。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结束了土耳其左右翼冲突等动荡的政治生态，民主化和政治稳定为民间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提供了社会基础条件。民间土耳其女性主义思潮与运动兴起及其组织化、专业化、身份化突破了数十年妇女群体的沉默状态，将土耳其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现实指向了男性霸权和父权社会的本质特征，并且批判和质疑了国家女性主义对于改善妇女问题的现实功能及其偏狭传统的女性观；同时，女性主义组织不仅在公共领域推动妇女问题的改革，在私人家庭领域要求反家庭暴力和不平等家庭关系，拓展了女性主义发展空间。这一时期的民间女性主义还体现在多元化身份的女性群体方面，库尔德女性主义和伊斯兰女性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将身份问题引入女性主义场域，不同身份背景女性群体的权利诉求既是边缘化群体的觉醒标志，也是土耳其女性主义多元化发展的重要标识。正发党执政后，依据其执政理念、保守意识形态和传统社会家庭观念对土耳其既有的妇女政策作了相应调整，并继续在法律、机制建设等方面推进妇女事业的改革步伐，推进了妇女权利发展的进步。与此同时，正发党的妇女政策在部分领域引起更为剧烈的争议。虽然头巾禁令已经解除，但正发党政府与激进世俗女性主义者、世俗女性主义者与伊斯兰女性主义者、库尔德女性主义者与世俗女性主义者

之间，在涉及妇女地位、权利、义务等方面仍有不少矛盾点，加剧了土耳其女性运动发展的复杂性。多方影响下的当代土耳其女性主义运动，相较于20世纪更趋均衡与多元，提升了妇女在土耳其政治与社会事务的参与度与影响力。

同时，我们应辩证地考察和分析土耳其女性主义的发展演变。一方面，土耳其女性主义思想应遵循本土化方向，充分汲取西方女性主义不同流派思想的积极内涵，但也要避免过度西化和绝对化等现象。现代女性主义思潮起源于美国，盛行于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而作为发展中世界的女性主义运动，既不同于西方中产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环境，也处于差异化的社会发展阶段。虽然土耳其是伊斯兰世界世俗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但其社会文化和思想价值观念体系等方面仍属于伊斯兰文化范畴，西方女性主义提出的部分性别观、平等观、权利观、社会理念以及政治理念等内容，需要适应土耳其本土国情和社会文化传统，因而需要土耳其女性主义团体调适、兼容其思想观念和社会政治主张；同时，对于部分激进女性主义思想的绝对化倾向<sup>①</sup>，也需要土耳其女性主义群体加以甄别，它无助于土耳其女性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另则，土耳其存在世俗女性主义、伊斯兰女性主义、库尔德女性主义等多种社会思潮，各派别之间宜求同存异，跨越宗教、族群等界线，共同推动土耳其妇女权益与国家治理的协调发展。

当前，正发党治下的土耳其，国内经济持续不景气，政治和社会发展压力增大，部分妇女权益与发展问题仍十分突出。从2002年以来，针对土耳其妇女的谋杀案件有一定上升趋势。2018年，土耳其被谋杀女性达到大约440人，比2002年增加了6倍，<sup>②</sup>其中包括荣誉谋杀、家庭暴力等致死因素。一些土耳其妇女仍深受家庭暴力的伤害，据统计，41.3%的土耳其妇女遭受过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sup>③</sup>在社会就业、受教育、政治参与等方面，土耳其妇女仍面临着多重社会不平等。总之，推动土耳其妇女受保护的生存与发展权利，

---

<sup>①</sup> 田雨：《女权主义的划界、反思与超越》，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6年，第97～101页。

<sup>②</sup> Zeynep Bilgehan, “440 Women Were Killed in 2018 in Turkey: Women’s Rights Group”, *Hurriyet Daily News*, February 25 2019,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440-women-were-killed-in-2018-in-turkey-womens-rights-group-141464>, 2019-04-28.

<sup>③</sup> Fatma Basar and Nurdan Demirci, “Domestic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Turkey”, *Pakistan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 No. 34, No. 3, 2018, p. 665.

降低家庭暴力和性骚扰现象，实现妇女教育、就业、参政等方面的平等，仍是未来土耳其女性主义运动的主要目标。

##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Turkish Feminist Thoughts and Movement

*Yang Yulong*

**Abstrac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dern Turkish state in 1923, the Kemal government implemented top – down state feminism reforms, and the bottom – up civil women’s movement also emerged at the same time, leading to the two – way interaction between Turkish feminist thoughts and movements. Therefore, women’s equal rights are guaranteed to some extent. After the low tide of women’s movement, in the 1980s and 1990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urkey’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environment, Turkish feminist thoughts gradually divided. Those feminist thoughts, represented by secular feminism, Islamic feminism, Kurdish feminism, and through various types of women’s organizations, carried out social movements and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progress of the Turkish women’s rights. The religion, secularism, ethnicity have become the dominant factors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feminist thoughts. After the AKP came into power in 2002, there are still many disputes between the AKP Government and radical secular feminists, between secular feminists and Islamic feminists, between Kurdish feminists and secular feminists in relation to the status,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women. The debate on feminist thoughts has exacerbated the complex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urkish women’s movement. How to further advance the status of women and achieve equality in women’s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remains the main goal of the future Turkish feminist movement.

**Key Words:** Feminism; Turkey; State Feminism; AKP; Islamic Feminism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冯基华)